

# 作为中国转型参照的 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 Democracy as China's  
Transformation Reference



趙京 Jing Zhao

# 作为中国转型参照的 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 Democracy as China's  
Transformation Reference

趙 京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01998-4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sville, NC  
27560, USA

**Rights Owner 版主:**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Copyright 版权:** © 2008 Jing Zhao 赵京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Distribution 发行:** DT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www.dt2002.com](http://www.dt2002.com) DT 国际出版社

**China Agent 中国代理:** Mr. Wang 王平 (成都)  
[wping33@gmail.com](mailto:wping33@gmail.com)

**Japan Agent 日本代理:** Mr. Li 李梁 (青森)  
[liaosa@yahoo.co.jp](mailto:liaosa@yahoo.co.jp)

**Edition 版本:**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Version 印次:** Second Printing 第 2 次

**Character 字数:** 32 千字

**Date 日期:** November 25, 2008 2008 年 11 月 25 日

## 出版说明

我在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4 月号发表约 9 千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与中国的未来”文章后，收到一些反响。例如，日本学者东扬仁在 1990 年 10 月 12 日致《民主中国》编辑部信中评论到：“对于赵京《社会民主主义》的感想：作者知识很丰富，研究很深，令人佩服。尤其是 2-1(第 13-14 页)、2-2(14-16 页)好。…我觉得内容有点过深，特别是第 10 页的图表我根本不懂。”其实，此文不是学术论著，而是普通读物。

1990 年 5 月 1-10 日，我把它扩写成约 4 万字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国社会形态论纲”，发表在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9、10、11 月号（发表时被编辑为 2 万 6 千字）。同时，一家在美国的中文民主运动刊物也发表了此文，可惜我目前找不到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了。这大概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较为系统考察的第一份中文文章，读者特别可以感受到对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反思。后来，【民主中国】总编李梁先生希望以专册的形势出版此文，我于 1995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简单修订此文，但没有机会出版。

间隔十八年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更接近安那祺/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转型中剧痛的中国社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关心不断提高，所以，我决定简单修订 1995 年版原文，改变标题以第二版的形式出版。我计划在第三版出版时再加入 1990 年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变动考察。我最近出版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978-0-557-01635-8，同一出版社）和《韦伯论社会主义》（ISBN:978-0-557-01998-4，同一出版社）中对社会主义有深入的评述，希望读者同时参考阅读。

赵京

2008 年 11 月 10 日 美国圣拉蒙

# 目 录

## 序言

### 1. 变革时代社会理论的贫困

1-1.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

1-2. 马克思理论的几点局限

1-3. 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缺欠

### 2. 近代社会变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

2-1. 东欧、苏联变革的实质

2-2. 社会民主主义的来源

2-3. 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形态和影响

2-4. 从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的理论

### 3. 中国社会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3-1. 共产主义全权政治形态下的中国意识形态

3-2. 对十年有限改革的回顾

3-3. 适应于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国社会形态

## 序言

任何社会活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后世产生影响。第一种途径是历史的结局被新的时代继承（例如文革的结束、1978–1989 十年有限改革的终结），这种形式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时间上越发短暂、在空间上越发广泛。但这种影响也往往很浅显，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淡化、消失，由于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在社会形态方面几乎没有进化，我们看到的总是历史的反复——“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对历史的反省力图寻找出对后世有益的时代精神而达到的。修昔底德是这种认识的开创者<sup>1</sup>。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以 1/3 的篇幅议论（或借他人之口议论）当时的事件，特别是通过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说，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提示到人类组织形态的高度，启迪后人如何组织社会秩序<sup>2</sup>。

历史认识的途径，在中国最初也曾具有强烈的反思传统。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涌现出来、至今未能超越和完全理解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精神。

---

<sup>1</sup>早于修昔底德，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罗德希德由于只是记叙传闻未加考证，未能完成历史学的创建任务。

<sup>2</sup>修昔底德被剥夺了舰队指挥权，得以置身度外，观察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感悟出超越古希腊半岛的历史进程的意义，开历史学先河。

当时有“孔子辑《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记载，但这种传统自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的专制统治以来就再也不复具有反省历史现实功用。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史学，虽然注重道德的垂训，又拥有悠久、丰富的成果，却多是儒教的脚注和佐料，成为当政者御用的工具。没有可信的当代史的中国人，很难从文学艺术的夸张或虚伪枯燥的数字罗列中去寻找历史精神。直到另一次民族悲剧的发生，才体会到历史的重复是何等惊人地雷同。

例如，近年来，国内的学者们对于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文明传统中缺乏对知识的反思机能，中国的文明可以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具体归纳，却不会提出并回答“科学是什么？”这样的抽象思维的“元科学”问题。这种思维机能的缺陷，决不是可以填补的“学术空白”，更不只是多少年的“差距”问题，它漫布于整个知识文化中，在社会科学(包括民主运动理论)方面更为突出<sup>3</sup>。反

---

<sup>3</sup>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的专制统治，已经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华民族丧失了理论思维的机能。我们可以说，中国有社会学的研究（家庭、人口等问题）却不存在社会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如阶级问题不能被研究，陈云就最恨最怕有人胆敢问“谁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这样的问题。社会调查的基本条件也不具备。笔者 1987 年在留日同学中组织问卷调查，包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看法，就被没收了护照。更不用说中国

过来说，当我们感到现有语言、理论无法表达我们的思想时，就孕育着重大进步的可能<sup>4</sup>。

西方文明的进步在于它不断地从历史的现实中提取精神的实质来丰富思维机能。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六四”事件为止的十年有限改革，也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的激荡，甚至上溯到秦始皇以来大一统局面下的改朝换代，而精神思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以来除了点滴的荧光，几乎是空白、断层。所谓文明的衰退，就是指精神思维机能的消亡。中国的专制得以维持四十多年，至今没能发生东欧、苏联式的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任何社会运动都由三个层次组成：理念、理论与实践。例如共产主义运动，其平等、公有制的理念早就由柏拉图、基督教文明、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表述出来并广为流传，为社会所熟知的了。但直到马克思对此作了理论的整理和分析，才形成、引导了至今为止的、构成人类历史的共产主义实践。

中国今天的民主运动，可以称之为“没有理论的社会运动”，这也是为什么民主运动水平不高、难以继续扩展的重要原因。作为理念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是基于人性和社会现

---

所谓的“政治学”、“法学”等的状况了。

<sup>4</sup> 正如康德哲学的状况一样，连概念也得从头定义。

实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从事民主运动，或者在十年有限改革中从事启蒙教育，只不过是把它明确地表达出来而已。对于理念的表述，并不是民主运动自觉追求的目标，如果中华民族认为专制、封建是可以忍受的社会理念，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杞人忧天了。

“六四”事件之前，中国的现实没有产生思想家的基础和必要性，人们的关心全集中于政治、经济的无常激变中，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也难免于此。人们满足于打听人际纠纷，扩散关于国内动态的“小道消息”（《争鸣》杂志最有价值就在于它提供的情报最秘密），指责或挑剔民运组织的运作，对一些政策性的观点品头品脚（如对严家其的联邦制设想、万润南的“中产阶级民主论”<sup>5</sup>）。很象“五·四”之后的情况，有了科

---

<sup>5</sup>从民主运动的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就是“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人格权力和负有社会责任的自由。但对于有八亿农业人口的中国，政府有责任保障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平等，忽视农民利益，没有农民参与的运动最终只会是失败的运动。所以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民主论非但不现实，而且弊大于益。中产阶级并不是任何民主运动、甚至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只是民主建立起来后的享受者，具有保守意识。在日本，中产阶级最早是指那些有教养的、能够与美国占领军同住在“高处”富裕区的人，他们有安定的收入、房产、甚至还可以雇一个佣人，而在菲律宾，提起“中产阶级”，人们会联想起马科斯或阿基诺家族来的；韩国的政局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中产阶级民

学、民主的理念，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呢？毛泽东是一个榜样，他曾在北大的图书馆中研读过象孟德斯鸠的《法意》这样的论著。他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最终提出：以唯物史观建党。正是这样的提升，才使科学、民主理念变成了最终导致共产主义政权的人民运动。

我们的民主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层次上的升华，只能是一场短命的悲剧，或者只是唤醒后人的历史牺牲。民主运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可以分为三类：（1）组织起来。这是基于“六四”大屠杀惨痛结局的教训，民阵的成立就是最大的结果。组织起来可以展开许多活动，但也有不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人数有限且几乎不能回国等。

（2）情报宣传。这一条仅民运组织无力承担，也没有必要独自承担，因为民主的事业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事业。凡属开放、交流、引进的各项行业（新闻、旅游、科学、技术等等）都在致力于现代化的事业，也是远远超出政治含义的民主化过程。（3）关于中国的未来以及民主运动性质的理论探讨。我们应该对大陆的民众，拿出一套

---

主化”的神话，它的左翼分裂，学生运动又走向暴力（冲击美国大使馆、校园内打死警察）、由逆反心理而接受共产主义以及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如派林秀卿去北朝鲜出席十三届青年祭典）而导致歧途，其成熟、稳定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出现呢！更何况中国的十一亿民众。

成系统的、符合大陆人民心愿的社会理论来。这是目前极为重要却又被普遍忽视的问题，没有社会理论，我们怎么可以简单地把诸如“联邦制”、“产权私有”、“多党制”这么多政策性的观点宣传给人民呢？也难以有理有据地反驳北京政权强加的“全盘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谩骂。我们目前身在海外，民主运动又处于低潮，正好可以借鉴欧、美、日等国的情况，参照最近的台湾民主化进程，潜下心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更幸运的是可以直接学习、分析苏联、东欧的社会变革经验与教训。

越是个性(区域、时代、个人特色等)的东西才越具有真实的普遍性，中国理论思维机能的扩充，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的累积、组合，而更是人格的体验。不同时代的历史感知是人类精神发达史的唯一创造源泉。

## 1. 变革时代社会理论的贫困

### 1-1.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

核武器的出现促使人类在其走向灭亡之际具有了理性的能力，要求国际社会必须组成新的世界秩序。在马耳他会晤的两个超级大国首脑并不具备比雅尔塔会晤的首脑们更多的良知和更高的道德勇气，而是全球范围的人类理性的增长具备了防止世界战争的能力。这首先要归功于反抗本国当政者霸权主义的良知，最早体现在核物理学家的反省和警告（海森堡等德国科学家对纳粹当局的不合作态度、玻尔在哥本哈根的演讲、爱因斯坦的忏悔等），再有日本民众在广岛、长崎的纪念活动，社会主义国家上亿人的签名，萨哈罗夫为代表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sup>6</sup>，在削减中距离核武器 INF 会议的日内瓦会场堆放的成堆成堆的签名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脑是何等的激励啊！

促使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飞速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近代社会的合理组织形态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前提。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里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也是经济发达的最重要衡量指标，我们可以

---

<sup>6</sup> Time 周刊 1990 年 5 月连续报道。

先来考察较为简单的科学技术发展理论，以便进一步考察社会发展理论。

关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最著名的可能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理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常规科学阶段性地变革、由新的科学革命引发新的科学规范的过程。库恩本人是理论物理学出身的，任何一位熟悉物理学史的人都会对其论点产生同感。稍微推广一些，我们也乐于以这样的立场来理解其它的以数学运用为基准的“严密”<sup>7</sup>自然科学如数学(由欧几里德到微积分的变革)、化学、生物学的发展。但类推到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则会引起极大的争论和混乱。

实际上，严密自然科学本身（包括物理学），在现代社会的更新、发展，已经不可能分出截然明了的“常规”与“革命”的不同阶段了。库恩遭到强烈的批判后晚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某些立场。而形成科学哲学主流的是由欧洲人文传统培育出来的波普(维也纳学派)、罗素、怀特海<sup>8</sup>、维特根斯坦、赖欣巴哈<sup>9</sup>等人的逻辑经验实

---

<sup>7</sup> 由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所揭示，连物理学这样的“严密科学”其实也不“严密”，只是相对精密而已。

<sup>8</sup> 以我们的思维训练，读不懂他们的《数学原理》。怀特海的《近代科学的精神》也不通俗，但可以感受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本文所引书籍，只靠写作时记忆里的书名和基本内容，无法详细列出出版社和时间地点。

证主义所表达的理论。他们认为：科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被批判、不断更新的过程，专门把通常科学与科学革命区别出来，容易忽视科学发展的本质。

库恩的理论，从方法论上看，其特点是缺乏辩证法的归纳主义，由具体事例断言普遍规律，这是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优劣并备的特点，容易提出新东西却不太经得起批判。这个特点，也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带有的不可避免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的深远和庞大更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在社会实践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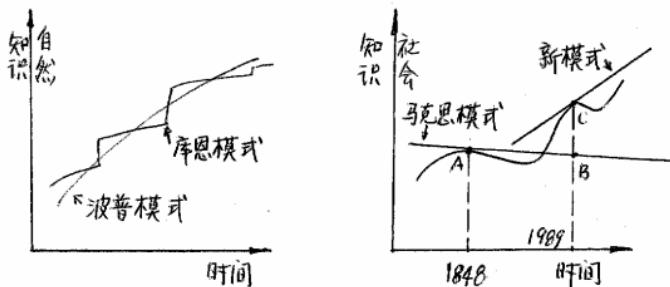
本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对两者的区分界定为：文化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发生的记叙和描述，是特殊性的事例；自然科学则是可以重复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法则。前者（以历史学为代表）的每一个事例、人物（如耶稣、拿破仑）都有特殊性值得研究、揭示出来启示后人；后者（以化学实验为代表）的每一个事例都只是普遍规律的表象而已。中国社会的残忍性就在于每一次历史事件都成为专制统治下普遍常规的实验，十年有限改革就成为这样的没有特殊意义、没有新的创造的“现代洋务运动”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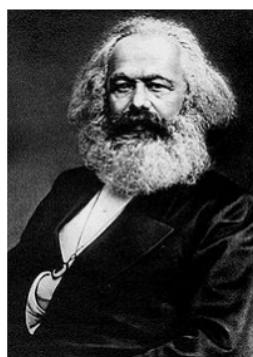
<sup>9</sup> 《科学哲学的兴起》可以当教科书来读懂。

实验牺牲品。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用下面的非常不严密的图式来区分。



其中，纵坐标既包括知识量的积累，也包括对事物认识的质的接近度。自然科学的知识是随时间增长而增长的单调曲线，对自然的认识随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多、精确；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是不规则的非递增曲线，所有人类思想理论可以看成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种思潮构成的切线对现实曲线的接近。任何理论模式的局限在于：它不可能准确无误地知道未来；它关于本人经历之外的世界、当时所处环境之外的时代的知识，随着时、空距离的扩大越来越淡薄、贫乏。例如，马克思的理论，越接近十九世纪中期，越接近德国（图式中省略了地域轴），其理论直线与实际曲线就越符合。但马克思当时对于中国社会没



有什么知识；对于俄国社会、美国的南北战争，可以读到一些过时的报纸新闻；对于南美的玻利瓦尔，只能依据一些传闻做一点没有把握的猜测判断<sup>10</sup>。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德国、西欧也展示出其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当然，那些今天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以说：那条实际的曲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会相合在马克思理论的直线预测上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集团决意无视“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沿着僵化的路线走下去，而且还不惜以中国社会作为实验要“拯救”马克思主义。按照数学的不证自明的设定，任何曲线、直线在无穷远处都是可以相交的。从这种无穷远处交集的目的论出发，中共政权可以证明贪官的历史贡献在于促成社会由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尽早进化，当然也可以设定今天东欧社会主义的各国的变革只是为更高的扬弃准备、过渡而已。不过，且不提地球寿命的有限、宇宙系统生命的衰危，人类可用的自然资源的限度已是屈指可数的了。

## 1-2. 马克思理论的几点局限

---

<sup>10</sup> 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参见《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

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分析，形式上与库恩相似，内容上主要归因于他的生活体验：对基督教文明之虚伪、近代工业文明到来的阵痛、以及普鲁士专制等的痛恨。

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逝世的致词中，把马克思的可以与进化论相提并论的贡献归为两点：剩余价值与唯物史观的学说。首先，必须公正地指出的是：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即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商品的可变价值与不可变价值的存在，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后世人把它“误解”为马克思的发明了。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剩余价值的经济理论赋与政治、社会的意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正统下的非道德、非合法性<sup>11</sup>。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形成对应于物质生产力的，独立于主观意志的、特定的、必然的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的总体构成了包括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要求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革，但旧的上层建筑，由于涉及统治阶级的利益，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就爆发了社会变革来改造上层建筑，使其形态适应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社会形态就进步了一个阶段，历史

---

<sup>11</sup> 见伯恩斯坦《科学社会主义怎么成为可能》，日文版。

就是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曲线<sup>12</sup>。

让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当夹杂着妇幼、激愤、欢呼、刀枪和彩旗的巴黎民众涌向关押政治囚徒的巴士底监狱、守卫在岗楼上的官兵们在人类命运的感召之下扭转枪炮与民众共同欢呼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一致把它定义为人类史上兴许是最辉煌的时刻。但在此之前，法兰西社会三个等级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一触即发；而卢梭、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把平等、博爱、自由、人权的理念“灌输”到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中去了。

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发深远地影响人类生活，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本身，也是人类深化对自身命运认识的一面镜子。从米勒的记叙<sup>13</sup>，梯也尔、基佐<sup>14</sup>的经济、政治分析，到饶勒斯为止的学院派研究的确立，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既代表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又对新的社会变革运动提供理论启示<sup>15</sup>。马克思的唯物

---

<sup>12</sup> 在实践中，列宁以《怎么办》强调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和他列宁本人）的救世功能，对无产阶级进行灌输、启蒙、教育、组织。这实际上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sup>13</sup> 其《法国革命史》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出版。

<sup>14</sup> M. Guizot, *The History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Robert Black. New York: National Library Company, about 1900.

<sup>15</sup> 标志法国大革命研究最高水准的巴黎大学“法国大革

史观中最关键的概念——阶级，就是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于伦敦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米里埃等王朝复辟的法国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古典经济学派的斯密、李嘉图等）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sup>16</sup>。恩格斯在 1883 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中重申他们在宣言开首的阶级史观：“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由生产的组织形态，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对财富的分配形式的考察使用阶级这个概念。列宁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

---

命”讲座教授阿布尔 1984 年到华东师大讲演。我 1986 年在华东师大教师阅览室读到其讲演稿。1985 年，其后继弗维尔教授在北京大学进行两周的交流讲义，我也有幸聆听，对其细腻的社会分析手法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很不理解他的法共党员身份。

<sup>16</sup> 此处引用日文版译文。

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17</sup>。对于阶级概念的定义本身，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不少争论，其中最有力的批判来自韦伯的“身分”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今天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地位”一词，Giddens 指出：由经济利益带来的各阶级的分裂，与基于主观评价而造成的不同地位，并不是总是一致的，两者是可以独自变化的。<sup>18</sup>

首先，美国社会首先表明了马克思理论的不适应，韦伯去过美国，看到了由于文化（学历）、种族不同带来的社会地位不同集团的分化，首先指出由经济利益、生产关系的形态不能全面说明社会事实和历史变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族的利益超越了阶级的利益集团是最有力的说明：那些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旗帜下的第二国际的劳动者们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大都

---

<sup>17</sup> 列宁：“伟大的创造”，收入《列宁选集》第4卷。

<sup>18</sup> 吉丁斯《先进社会的阶层构造》，日文版。

加入了各自国家的战斗行列。连考茨基本人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认为只要“不开第一枪”杀害阶级兄弟，就是社会主义者。为反对第二国际而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的最终功能，只是成为苏联帝国扩张的走卒。

其次，生产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很高，在消费领域，通过累进税制、福利措施等法律手段，可以保证很高的程度的平等分配。新的生产形态促成了中产阶层的成长，否定了马克思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预告，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带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

第三，马克思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无法提供任何说明，东欧、苏联的变革即使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终结，但起码可以证实“科学社会主义”最终仍然是空想，所谓无阶级社会只能是乌托邦。

另外，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功利性的扩张，已经不可能成为社会研究的有效工具。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社会科学中广泛运用的实证分析、调查研究，都很难用阶级、阶级斗争这样的术语来展开。对应于社会形态复杂的分化和分析社会的工具的发展，由不同地位集团在各个领域形成的不同阶层目前正成为社会结构、社会变动分析的基本术语。

### 1-3. 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缺欠

现代化、产业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界非常成功的理论，它多少克服了马克思留下的疑难。它主要归源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段论、杜尔凯姆由“无机体社会”向“有机体社会”转化的理论，以及韦伯的关于现代社会形态的官僚(科层)制理论、萨谬尔(G. Simmel)的实证进化观<sup>19</sup>、滕尼斯(F. Tonnies)的由村落集社向社会利益共同体形态转变的理论等。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西方的学者们找到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有力说明。例如由索罗金提倡的社会阶层理论到 P. Blau、O. Duncan 等人的社会阶层移动分析技术，成为实证社会分析的主流。在六十年代后期西方各国频繁爆发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以及至今的环境保护运动、反战、反核运动，虽然对社会造成了一时的冲击，但西方学者借用一部分马克思的观点，很快找到了分析的视角，如目前的资源动员论<sup>20</sup>，部分解消了社会矛盾。

当然，无论是贝尔、李普斯特的“后工业社会论”，还是社会学的“收敛”理论，都没有提

---

<sup>19</sup> 《社会分化论》，日文版。

<sup>20</sup> 盐原勉：《组织与运动的理论》，日文版。

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矛盾危机的良方。当代最有名的社会学理论要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了<sup>21</sup>。不过，他与默顿的“中范围理论”一样，不敢论及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甚至还武断地说：近代化的历史，就是除日本之外的殖民地的历史。这个“除日本之外”的用法似乎成了日本成功的奥秘魅力之所在。这种以殖民扩张的角色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局限使得其现代化、产业化理论从根本上就不适用于对中国社会变动的分析，也是几乎所有的受美国功利主义传统影响的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共同贫血症。

中国国民党基本上承受了这种殖民扩张的政策（主要还不是军事、政治方面，更多地指文化、经济生活方面），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中国社会对于这种扩张抗拒的成功。更广义地说，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伊斯兰革命都是对这种现代化扩张进程抵抗的变形。殖民的扩张可以在本身社会文化基盘弱小的地区成功，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度的失败，表面上是民族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则是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具备“迎接挑战”（汤因比）的文化精神——主要是缺乏西欧那样的由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传统——造成的。

---

<sup>21</sup> 笔者对其《近代社会的体系》和《社会类型——进化与比较》（日文版）写过书评，发表于美国出版的《民主中国》1994年6月号。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文化继承上的。实际上，《共产党宣言》中所体现的社会背景，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看成是对近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反应：人际关系、经济利益、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形态、民族独立、阶级斗争……，都是由工业化这个“怪物”带来的。但是，欧洲社会对应这个怪物的，有自伯里克利以来的民主理念，有但丁、达·芬奇、巴尔扎克、雨果、歌德、贝多芬以及莎士比亚的人本精神，有卢梭的契约论、霍布斯的人与人关系就是狼与狼关系的警告等。所有这些理论、思想，都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先导和基石。美国的成长也不只只是两百年的历史，《独立宣言》就是数千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杰佛逊、潘恩等人的建国思想已经为美国的成长奠定了牢不可摧的基础。但精神思维还没有超越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走完西方社会数个世纪的历程呢！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产业化理论不适应于中国很大程度是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区的成长能够带给我们多大的希望呢？实际上，这些国家、地区的成功确实在带给了我们不少困扰的同时否定了东方儒教文化不适应现代工业化文明的悲观，但它们的社会形态与中国截然不同。从本质上讲，社会形态的差异作用远大于相同文化的影响。

响，南北朝鲜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几乎所有的各种“模式”论点都忽视了社会形态的差异这个最根本的前提。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它与世界各国的社会形态又有什么共通和特殊的地方？

按照普通的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共产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特征都不只是否定意义，而是不可分别的同一中国社会形态的两重性而已。对于前者的认识，由于东欧、苏联的变革使我们有必要、有可能重新来审视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和方向，对于后者的认识则直接地由“六四”天安门事件揭示出来了。这双重特征，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中、西两大文明交融的产物。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来迎接现代工业化的到来的。所以，考察中国社会，一方面要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sup>22</sup>，更要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潮流中去探求，这样才能理解与共产主义特征并存的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转换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我们认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工具，也为中国的社会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

<sup>22</sup> 它基本上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只是社会形态对工业化发展的对应，而西方社会已经具备了对应的社会基础。

## 2. 近代社会变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

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认识，随着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生又反过来加深对过去历史的理解，而那些真正对人类历史有影响的事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加意义深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六四”天安门事件，我们不可能理解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 2-1. 东欧、苏联变革的实质

原《新观察》总编辑戈扬女士说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衰亡是人类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这句话用于中国、北朝鲜、古巴和印支三国是合适的，却不适用于概括欧洲的历史。二十世纪欧洲的历史可以看成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实践、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过程。社会民主主义最早的胜利是在斯堪底纳维亚地区，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成功地抵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偏激影响，从而也彻底地避免了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还躲开了两次爆发在隔壁的世界大战<sup>23</sup>。日本人类学者中根千枝把日本与瑞典的差距比成印度与日本的差距，这种差距可

---

<sup>23</sup> 这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的纳粹是极右的形式）有关。

以看成是社会民主化的程度不同<sup>24</sup>。面对东欧、苏联的变革，社会民主党的瑞典首相说；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来说，相对于无法控制的自由市场的暴乱，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选择。<sup>25</sup>

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主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由于共产主义的胜利，被灌输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混淆错误概念。首先必须指出：战后自称为正统社会主义的诸国苏联、中国、蒙古、北朝鲜、印支三国、古巴等几乎由共产党一党专制，被西方称为“共产圈”，是属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稍次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是以斯堪底纳维亚诸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近代史上社会主义有过许多流派，《共产党宣言》中就批判过的有“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加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在我们的时代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可以数出希特勒的国家社

---

<sup>24</sup> 相对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北欧更加理想，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制度问题”。帕尔默首相被刺是因为他没有任何保镖，也根本不需要这类措施。

<sup>25</sup> 一个资深的巴基斯坦记者对我说；他在西方生活了大半生，但他还是赞成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会主义德意志劳动党(纳粹)、纳塞尔、苏加诺、庇隆、卡扎菲、奈温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变形。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者由于对人类生活造成危害被扑灭了，或者由于其本身就没有生命力被淘汰了。目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产主义在处于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它将要如何变革呢？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波兰的合法化了的团结工会在全国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马克思说：一八四八年镇压(米兰与柏林)革命的那些当事者，与自身的意愿相违，成了革命的遗言执行人。葬送共产主义的，就是那些镇压柏林暴动、布拉格之春、匈牙利革命、团结工会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天安门事件，团结工会执政的含义难以明确解释，并没有普遍的必然意义。不少人都同意邓小平的判断：认为团结工会的胜利是由于波兰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经济危机、波兰共产党在军管、选举战术上的愚蠢、天主教会的煽动、瓦文萨的天才等等。所以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比波兰的同党镇压成功。但紧接着是匈牙利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从宪法上取消一党专制，又促进波兰共产党也分化为“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联盟”，团结工会执政后面临工人新的不满又恢复到工会的地位、性质，使其变革，与匈牙利一样，成为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

这种转变随即由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不同方式表明出来。在政治体制与中国、北朝鲜相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曾被宣布为非合法，却又立即遭到反对而撤回，这个戏剧性的插曲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转变到自由、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过程，这个过程，由苏共的 1990 年 2 月扩大中央全会表达出来，那就是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随即又在南斯拉夫、蒙古和阿尔巴尼亚也得到呼应。

这个转变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在它形成过社会运动的地区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其意义足可以与十月革命一样相提并论，同时也向人类宣告了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有俄罗斯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铁托（工会社会主义）、纳赛尔（有阿拉伯特色的社会主义）、卡扎菲（有利比亚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赵紫阳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这些类型的社会主义者，连马克思都不认其为门徒，他曾说过：“我撒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两次新纪元，都是由俄罗斯民族开创的。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时代，查理大帝曾是欧洲所有君主最后的大本营；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又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救

星；今天，戈尔巴乔夫为世界文明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希望。而戈尔巴乔夫超过赫鲁晓夫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最终否定了列宁的教条。戈尔巴乔夫五年前上台时虽然是打着“回到列宁去！”的招牌开始其“重建”的运动的，但是他远远地超越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因为他有明确的理念在指导着这场关系到整个世界文明的伟大转变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统共产主义者们深深地忧虑这一点，邓小平一方面安抚共产党，寄希望于“列宁故乡”的苏联人(即利加乔夫等保守派)；一方面又赶快把刚送给戈尔巴乔夫不久的“同志”称号又收了回来，因为戈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 2-2. 社会民主主义的来源

对于任何理论、概念的说明，都多少由于时代、地区的不同而赋予其特点。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包括许多人类文明遗产，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共产社团”的设想和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的“中庸的”市民民主形态的论述。《圣约》中的人格平等、财产平等的思想、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构成马克思理论来源的那些理论，以及成为西

方社会文明基础的那些思想（苏格拉底的人格、由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法律体系、“黑暗中世纪”时的教会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等）也构成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财富。应该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之一，尽管不是其主流。而成为今天的西方文明主流的思想家卢梭、洛克、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以及亚当·斯密、斯宾塞、孔德等人，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近代工业文明到来之际，主要关注于两个方面：对于“人”的重视和对于社会组织形态的改革愿望。前者最明确的体现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以及四十多年前联合国的《人权宣言》。<sup>26</sup>

在中世纪，人是依附于神权和君权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权利。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可以用“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改造自然，扩大膨胀了人的欲望和丑恶，所以出现了人性恶的思想；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幸福等人权不至于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必须组成政府来保障整个社会正常地存在；关于政府的职能、性质也是出于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多数利益，其形式采取“三权分立”的国家形态，也可以推翻不具备合法性的暴政。这些理想在实践过程，形成了资产

---

<sup>26</sup> 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北京政府至今未在其上签字。

阶级共和国的实践，特别由于其早期的资本积累、殖民侵略的丑恶历史，人对人的赤裸裸的经济压榨，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最根本原因。

社会民主主义的更重要的来源是社会主义。早期最明确的代表是“空想社会主义”<sup>27</sup>，特别是圣西门。他其实有两重性格；一个是由马克思继承了的社会变革的想象力，另一个是由孔德等人继承的关于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进化改良思想。圣西门深深意识到即将来到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并不把社会进步看成简单的政治革命或单纯的自然式的进化。遗憾的是马克思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关于社会组织形态进化、有机体化（复杂化）的思想评价过小，不如欧文、傅立叶懂得机器和产业社会。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一样，拒绝了关于人性理论的影响，这就是今天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痛的最基本原因<sup>28</sup>。东欧、苏联得以变革成功，也是因为它们所受的人性理论影响远大于中国<sup>29</sup>，还因为俄国有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非单一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

<sup>27</sup> 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对比作为社会主义实业家的欧文，马克思才是“空想家”。

<sup>28</sup> 李鹏声称：“没有国家主权，何以有人权？”全不知人权为主权之基础与目的。

<sup>29</sup> 俄国文学巨匠普希金、妥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成就，都是人性主义的发扬。

社会民主主义由于其在第一、第二国际中的领导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其思想上的领袖就是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指导和批判确立其理论的领导地位，但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必须批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反对派，特别是在德国最有影响的拉萨尔和杜林。与马克思竞争的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更有影响，而接近马克思的贝贝尔、李普克内西也令马克思不满，迫使马克思写下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以确立思想上的领导权。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动，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身在伦敦，使得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得以依据德国的实际情况展开运动，其中的两名思想领袖伯恩斯坦、考茨基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更是大胆地修正、解释马克思主义，使得德国的运动成长壮大，成为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1890 年德国虽然制定了“社会主义者法”压制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势力在第二年的全国选举中获得 140 多万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心的原因不仅是它在实际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贡献。马克思去世之后，世界局势、社会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恩格斯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对于他们过去的理论谨慎起来，多次表明必须重新审视，一些实际的策略，如街头革命就由于



军事武器的发达变得不现实起来。伯恩斯坦（插图）在整理出版《资本论》时甚至敏感地查觉到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后期也对自己前期的一些判断动摇慎重起来了。银行小职员出身的伯恩斯坦，被普鲁士政府通缉而不得不离开德国，没法亲身参加运动，便专心研究经济问题，成为解释马克思的权威。

他首先由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研究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竟然“意外有生命力”，特别是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对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的没落”、“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提出疑问和否定，并进一步否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告，否定暴力革命而提倡走议会道路，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区别于以后的各种别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最大特性。而同时代的拘泥于马克思教条的默林、拉法格等人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伯恩斯坦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典型代表。尽管在其之前，曾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诸学说存在疑问，但伯恩斯坦是从全体上对马克思进行修正并指明新时代下运动策略的第一人<sup>30</sup>，也代表了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每一次危机或转

---

<sup>30</sup> 其实，恩格斯晚年也有所转变，只不过不可能彻底。

机的萌芽。伯恩斯坦指出，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因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而且，马克思的学说既然是有党性的，就不可能具有科学性。科学的实质就是非党性的、排斥价值判断的东西（康德）。伯恩斯坦进一步断言：“我对那些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这些东西，不论怎么的目标，对我而言都是无，运动才是一切。我指的运动，是社会全体的进一步的运动，以及为实现这些运动而进行的政治社会宣传和组织”<sup>31</sup>。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战略，就不该是空等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也不是在经济大恐慌下的暴动，而应该积极地参加各种可能利用的以工人为主体的、超越了无产阶级狭隘局限的所有社会阶层的、和平的、以议会民主为主的有效活动<sup>32</sup>。伯恩斯坦本人就是这样实践的，不幸的是他晚年的活动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误解，遭到考茨基、贝贝尔、李普克内西、卢森贝、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批判，被打上“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更被后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共产主义完全无视了。随着第一次大战的爆发，

---

<sup>31</sup> 《崩溃论与殖民地政策》（所引为日文版）。这样的宣言，倒很象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行动”派。

<sup>32</sup> 《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所引为日文版）。

考茨基、卢森贝以及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等社会民主党人遭到列宁（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列宁以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组建的俄国共产党和第三共产国际，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而确立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并演变成共产主义运动。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成为几乎每一次共产党内部危机的萌芽和内部斗争的口实。

江泽民在提及中共与东欧、苏联的几点不同时，只有一点讲对了：中国没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影响的历史。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变革与东欧、苏联不同的最大的课题和关键：中国没有产生伯恩斯坦的社会环境，晚年陈独秀开始对共产主义的“黑暗中世纪”的批判，远远超出了托洛茨基派的视野，力图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但他已经被时代的转换淘汰了。陈独秀可谓一个被抛弃的先知。

## 2-3. 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形态和影响<sup>33</sup>

---

<sup>33</sup> 这里没有考查南美、非洲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连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也声称他们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的社会基本上属于西方经济、文化殖民扩张的附属，或者是对扩张的过剩反抗形态，政治社会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可比较的意义。

##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最早实践的斯堪底那维亚地区，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市民议政、决策的传统。例如街区居民想改建住房，除了向市政厅申请外，必须公开立一个牌子说明情况，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动工。那里最早实现了妇女投票权、普选、累进税制等保障社会福利的民主改革，取得了国际上的成绩，成功地克服了三十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抵制了马克思的过激影响，彻底杜绝了“极左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极右的”纳粹兴起的社会基盘，除了被占领的国家(如挪威)，基本上都没卷进二次世界大战。戈尔巴乔夫回答西德总理科尔的提问，说“重建社会主义”目标是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 【德法式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典型形态(不必称为“制度”)是以德、法为代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俄国革命的冲击，1918年，以小李普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激进派——斯巴达克军团，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暴动遭到镇压，结局是温和派组建了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府——魏玛共和国。其魏玛宪法导入了许多近代史上的革命原理(如社会权的保障)，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民主。但是由于德国是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分裂出两大对立势

力——第三国际支配的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党的法西斯势力，破坏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其所谓“随时代大流”的观念被批判为“给与法西斯成长的机会”（法兰克福学派）；而共产党则认为社会民主党是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对头，只盼望等纳粹取代了社会民主党，达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再由共产党一举取而代之。其结果，军火工业完备的德国工业加上屈辱复仇情绪支配下国民心理选举诞生了法西斯政权。

战后，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其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是在 1959 年采纳的哥德斯堡纲领，由阶级、革命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转变为全民、议会政治性质的政党，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竞争经济，在具体的内、外政策也实行了重大转变。如时任总理的勃兰特（插图为被时代杂志评为 1970 年人物的勃兰特）采纳“东方政策”，与东德交互承认，完全诀别了马克思主义。在伯恩斯坦的故乡，取得了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后的十年，成为西德的最大执政党。西、东德国人的不同只是相同的社会民主主义下“自由主义”体制与



“社会主义”体制的不同，东德的“自由论坛”在野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甚至社会统一党本身就是由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由于苏联的干涉，社会统一党以斯大林的共产党模式存在，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党内及东德社会里仍然很强烈，<sup>34</sup>所以昂纳克也找不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东德”的借口只好下台。

法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与德国相互影响而形成，其共产主义的势力战后也曾很强大，在冷战的两大阵营对抗中一直是最左翼的。五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成为其思想领袖，六十年代戴高乐首先与美国闹翻，与中国建交令美国人大为光火，尼克松自我解释道：法国由于大革命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新潮流的发祥地，现在由于没有实力领导世界了，只好向美国挑战了<sup>35</sup>。

这种解释，很象中苏对抗的情形，不过，法国的选择与其说是出于野心勿宁说是由于社会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而决定。近来，克服了内部龟裂的社会党，实现了密特朗的连续执政，密特朗俨然以“欧洲总统”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两年后结合成一体的欧洲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就是法国主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类

---

<sup>34</sup> 昂纳克支持中共在天安门的镇压，但德雷斯顿市委书记却发表声明反对中共的暴行。

<sup>35</sup> 《领袖们》。

型，其委员长多次表明欧洲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性质。

西欧的别的小国(如奥地利社会党 1970 年以来连续执政)的情况几乎与德法相似，只有意大利共产党，由于其历史上葛拉姆西、卢卡奇的影响，打出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反对斯大林模式的“西欧共产主义”旗号才成为西欧的最大的共产党。西欧共产主义最大的特色是提醒人们对核战争威胁的重视，避免核战争——世界毁灭的唯一途径是否定暴力革命。告别过去的共产主义，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的“和平共处”理念相通。然而，最近它不得不易帜更张了。

### 【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

英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英国能够提供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弟子伯恩斯坦等人避难、活动的场所，本身就表明它的社会基础经历了宪章运动、工会改良运动及讲坛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等的影响，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阶级得不出革命的结论<sup>36</sup>，马克思把它归结为“英国工人阶级分享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殖民利润，忘掉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此同时，对英国社会的认识，有密尔、边沁的功利

---

<sup>36</sup>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布思自费对伦敦贫民区进行调查，写出了长达十七卷的调查报告，使国会通过了济贫法案，这是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法案，也是西方国家从“法制社会”<sup>37</sup>向福利社会转变的开端。伯恩斯坦时常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批判为“基于英国的特别体验”，他断然否认这一点。<sup>38</sup>不过，他毕竟看到了超出德国的社会主义特点。

那么，自由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呢？美国的建国历史是一种特例，它的社会构成（人种、文化）与别的国度相差太大。独立战争的领袖人物都是启蒙思想家的彻底信徒，但它的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靠南北战争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达成的。林肯的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说成为美国版的伯里克利演说。从经济上看，罗斯福的“新政”主要是采取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克服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其巨大的军工产业却成为沉重的负的遗产，助长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直接介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 【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没有美国的占领，日本的社会形态不会形成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局面。在战前，日本社会深受欧洲、俄国的各种思潮影响，社会主义的传

---

<sup>37</sup> 即警察社会，在其体制下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

<sup>38</sup>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历程》，日文版。

统很强，中国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包括象“社会”、“民主”、“主义”这些词和概念本身首先是由日本介绍过来的。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俄国革命的胜利，对日本的刺激很大。如鲁迅介绍的德国、俄国文学就来自日语。另一方面，由于与美国的关系，在朝鲜战争、苏美对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后，再加上左翼势力的分化，使自民党始终得以维持单独执政。但随着日本对美国依赖的减轻而呈现出自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日本的社会党在战后曾经拥有 1/3 的支持率，始终是日本社会“革新”力量的主流，呼应由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接近。而被称为“没有意识形态”的自民党的各种政策也打上深刻的社会民主主义印迹。

日本的 100%的高中就学率、近 40%的高等教育就学率，以及世界发达国家中最小的贫富差别，工人、职员每年“春斗”（春季罢工，只是象征性的，并不真实行）后以 5%左右持续上升的工资，以及连任何一个小店临时工都具备的主人公精神，是任何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的。也令所有的倡导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自愧无言。更令日本自豪的是：经过六十年代高度经济成长的日本克服了石油危机，在与美国摩擦中不断争强的竞赛中顺利调整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大国。其国民在七十年代的意识调查中，有九成认为自己属于“中层”，这个“一亿总中流”的

“日丸”号巨轮岂可能产生于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最近的参、众议院的选举中社会党的跃起也符合了世界缓和、由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转变的潮流。

八九运动期间，不少日本下层的人（包括极左派的日本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学院）都对天安门的民主女神像提出疑问，怀疑我们对美国社会的向往是否过于天真，由于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这些人士后来也就不再对中国民运抱有更大的关心了。整个日本社会，其国民性具有很强的保守意识，在外交政策上人权意识欠缺，是一个如上届美国总统候补民主党提名人之一杰克逊所说的“赤字国家”。长崎市长因为说了天皇有战争责任竟遭到枪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在日本受迫害的经历推动着它的国际化和民主化。

国家社会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从现在起，日本和包括统一德国的欧洲共同体，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最具活力的舞台，将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

中国的社会，与欧洲的文明和历史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中国不会与人类共同的历史命运相异，更不会背道而驰。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的现代化是很好的提示，而中国不反“全盘西化”（马克思是西方来的），还要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更表明了中国文化融汇西

方文明与人类历史有共同命运的事实。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选择，主要地不是因为“六四”大屠杀、共产党四十年的统治，以及归于“斯大林模式”的各种罪行的理由，而是由于以列宁主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身违反了人性。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国家或官僚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sup>39</sup>。每次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标榜自己是真正马列主义者的人就爱引用列宁的教导：“承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由此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除了列宁主义，当时的中国也曾传入过各种思潮，胡适以实用主义出发，提倡“少讲些主义，多研究问题”。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加入孙中山先生重组的国民党，以及中苏的密切交往，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完全理解为俄国革命的共产

---

<sup>39</sup>俄国革命本来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共同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掌握了一切权力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只在刚从农村出来的下层工人、士兵中占有优势。两者在一系列政策、利益上发生冲突，当社会民主党人被宣布为暗杀列宁的凶手时其合法的地位即被推翻。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曾积极参加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但最后也不得不流亡美国。真正传到中国来的，就是列宁式的一党专制共产主义。

主义模式了。

列宁之后斯大林体制产生，苏联对中国日益表露出来的野心引起了国民党排共的心理<sup>40</sup>，而孙中山先生的去逝促成了国共的分裂：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确立了右派蒋介石的主导地位，共产党也发动数次暴动，失败之后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逼上井冈山的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不可能走议会道路了（而不是不应该），这是中国社会不能容纳社会民主主义的悲剧的开端。

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具有很强烈的社会主义性质。民族主义最先是针对清王朝的，后来成为国民革命纲领中对抗外强的依据，这个思想在实际运作上，共产党认为国民党依靠英美，国民党则以此指责共产党依附苏俄，直到后来共同抗日才一致起来。民权主义可以认为是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不分阶级、政治信仰的全民政治，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对立；而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去了欧洲，看到了贫富不均的事实，认为西方社会的各种学说没有重视经济上的平等而后来加上的。可以判定，三民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

---

<sup>40</sup> 在此之前，李大钊等人曾公开主张把外蒙划给苏联，认为那样可以让一部分人民先享受到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参见《顾维均回忆录》。

是国共双方统一和平的基础。<sup>41</sup>

正如不可能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一样，也不可能存在世界范围的、有实质意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联合。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被开除共产党员资格的陈独秀力图组织中国托派也只能是徒劳。现代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只是政治形态的差异，而更主要地表现为民族利益的冲突，最近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就是明证。

没有受到过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影响的中国，在实行由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中，遇到了比东欧、苏联更大的困难。但是，这只是外因，社会本身的发展才是内因。列宁大概决不会认为在苏联也会发生“只可能在伯恩斯坦故乡才会发生”的变革吧！但只要社会需要，苏联共产党就自然会产生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出来。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失去了地位，但不断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表达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来，不时地出现“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言人，而且不断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改造着共产党本身。中国既然在进行着与苏联类似的历史过程，也当然会产生类似的思想和人物来，陈独秀、胡耀邦就

---

<sup>41</sup> 当然，不能说国民党完全代表三民主义。现在，中共“五一”时也把孙文的画像放到天安门广场。

是典型的代表。而邓小平，虽然违反了其本人意愿，也扮演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功能（尽管他自认为是坚定的反修战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毛泽东的决议与苏联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是历史的反复！西欧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变形）对核战争的认识影响了今天的苏美缓和，连中共也放弃了历来重弹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场的重点在欧洲”的老调。与机会主义者邓小平相比，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不自觉地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在从事“改革、开放”，因为“修正主义”是挽救共产党本身的现实路线。由胡耀邦、赵紫阳表达出来的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公务员制度的转换，社会协商、对话



体制等思想，都与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同出一辙。中国并不一定要以某个人（如赵紫阳）的面目来实行社会民主主

义的变革，甚至连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不一定要用（正如戈尔巴乔夫用“重建”一词似的），但只要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来理解中国的变革，就可以看出它是一条贯穿于整个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历史的主线。社会民

主义并不排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中的优秀成分，但象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基本原则”应该成为历史名词了。

#### 2-4. 从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的理论

伯恩斯坦说：“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依据事实所做的订正。”<sup>42</sup>任何社会理论的变革，都首先由实际的体验提出来，然后再去寻求其理论的依据，判断其必然性。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位与伯恩斯坦同样著名的人物是与其同时代的考茨基。由于缺乏伯恩斯坦那样的经济知识，考茨基的修正要稍晚一些，起初还与正统派一同攻击伯恩斯坦。考茨基主要是从历史考察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写的《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没有得到承认，其中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用历史事例来套唯物史观的框架，<sup>43</sup>把教团、兄弟会等组织都列入共产主义组织。

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明确的分析可以在杜尔凯姆（插图）和韦伯的论述中去寻找。杜尔凯姆指出：



<sup>42</sup>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历程》。所引为日文版。

<sup>43</sup> 恩格斯告诉门徒们：唯物史观只是一种指南，还必须进行大量的具体研究。

共产主义有悠久的历史(上溯到柏拉图)，却只是在历史中不时地散见于个别思想家中；社会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进入近代社会后才产生的思想，一旦被提出，即蓬勃展开。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主义更属于思想家的丰富想象力，存在于简单、机械式联系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存在于高级进化了的、有机体联系的社会中。共产主义只能存在于原始社会中，那里的社会形态没有产生机能的分化，要求所有社会资源(物质与关系)的平均分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的共同特征是：面对高度发达、分化的复杂社会形式，它只能从最重要的社会财富(经济机能)的分配上要求变革，特别是想采取各种方式阻止经济的无秩序状态造成贫富的差别。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中产生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既不可能复活原始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在近代的发达社会形态中实行共产主义。<sup>44</sup>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实践来看，杜尔凯姆的预言是正确的：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都是社会分化不够发达、国家比较脆弱的地区。

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不废除私有生产资料保证了生产的积极性，又通过消费分配的税制调节贫富差距；在政治上保障人权、自由、实行多党制，并不过多干涉个人生活。而共产主义形

---

<sup>44</sup> 《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日文版。

态，一方面强制在生产资料、消费、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平均主义，所以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些只能在原始人中才可行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无法消除大规模国家形态中的权力、荣誉等方面的腐败性的不平等，阿克顿爵士说得对：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最严重的后果是扭曲人性。

与伯恩斯坦同时代的韦伯（插图），是马克思之后出生于德国的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



他目睹了马克思去世后的世界变动，也亲身参与了社会民主党（对于社会民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及实际的组织运作上的颓废颇为不满）、福音社会派等社会主义团体的运动，在他去世的两年前又经历了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后的各种动荡和俄国革命的成功。一九一八年韦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对德奥预备役军官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讲演，可以认为是他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总结。这个讲演重申了他的近代化、工业化的官僚、科层制论点，论证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必然失败。马克思预告了七十年后共产主义的胜利，引起了世界的激励和恐慌；韦伯预言了七十年后共

产主义运动的消亡，也是对马克思之后的一种回答<sup>45</sup>，同样引起了激励和恐慌。

他在讲演中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人支配人的消亡、资本主义的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结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事实的说明多受益于伯恩斯坦的修正，其理论上的考察，主要是从官僚制<sup>46</sup>论来展开的。即近代社会发展要求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形态(如国家)，必须从官僚、科层制的形式来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官厅、政党、军队、教育科研、工厂、农村等等。官僚制是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形态)只会以更加强制的形式来推行官僚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丝毫不意味着人支配人关系的消除，无论是工厂、农村、机关、军队、教育部门，凡是近代生活涉及的所有部门，都要求管理、运营权力的分配和集中。特别是在社会机能分化要求的共产主义形态下，一切权力都集中到国家的顶点上，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成为国家官僚的独裁，劳动大众的异化不但不会得到解脱，反而连生活等基本权力也被剥夺了。在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农

---

<sup>45</sup>此书 1989 年 8 月由笔者翻译，2008 年 10 月由美国 Lulu Enterprises 公司出版，ISBN：978-0-557-01998-4，<http://www.lulu.com/content/4519631>。

<sup>46</sup>这里的官僚的概念是指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而不是指成为社会弊端的制度。

民。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的报告中说：“过去，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连农民的人身自由也剥夺了。”<sup>47</sup>

韦伯的这些预言已经被几十年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所证明。促进美苏两大超级强权国家不断竞争的也是它们各自的国家官僚机构，苏联是政治全权主义的极权形态，美国是机能高度分化下的军、产、官联合支配体制。另外，中苏论争的实质也可以由此解明了：赫鲁晓夫宣布苏联进入了“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正在接近共产主义，所以作为阶级的敌对势力不存在了，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了，因此，共产党也由阶级政党转变为全民政党了。这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坚持，由于旧社会的残存和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再生(它们可以是西方国家的影响，也可以是修正主义政策下的产物)，阶级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反修防修”。而同时，东欧国家的学者们则认为：社会主义也与任何别的社会形态一样，其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东欧集团中最发达的捷克的社会学者通过调查揭示出：依据捷克社会民族的不同，社会上明显存在着在

---

<sup>47</sup> 体改所：《农民、市场、制度的革新》。

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社会集团。这一方面批判了中国共产党以意识形态来推断事实的错误，同时又表明赫鲁晓夫实行的改革设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改革愈深入，社会固有矛盾在很长时间内就会越深刻。

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是有着普遍意义的话，在不同的社会，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和过程。虽然欧洲和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了大致框架，但正如共产主义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一样，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也会有独特的展开。中国的变革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其社会形态的各个的方面的性质以及相互作用。

### 3. 中国社会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至今为止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诊断何其多也！但其中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表面对立实质相同的论点：从政治体制的共产主义全权形态来抨击时弊、从事变革和从文化传统的封建、落后形态来倡导启蒙从事改良。前一种立场有时被误称为“体制外改革”，多指那些远离甚至反抗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人，其心理上的民众基础虽然很广泛但缺乏实际政治、经济力量。后一种立场较为杂乱，可以把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代表的“务实派”与以《河殇》为代表的、自以为可以靠近权力中心的文人都归于此类。此立场在民众中几乎没有政治认同的市场，一些热衷于官场改良，希望借“民主”达到升官目的人在民众中留下反感情绪。甚至邓朴方、邓小平也可以强归此类，他们之所以把社会弊端归于“文化”、“传统”，是由于他们在社会政治形态中占有一定利益、权力。那些靠近权力的文人理论上贫乏、人格上缺乏独立精神，却偏偏认为自己“最了解中国社会”。新出头的“新权威主义”在八九民运中，学生、市民根本不承认其作为一种力量的存在和可支持性就是历史对其最大的讽刺<sup>48</sup>。

---

<sup>48</sup>顺带指出，“新权威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理论，是人们对赵紫阳的一种判断和假设。其所谓的内容几乎都是由批判者的肤浅讨伐构成的。

他们中的个别人也是海外民主运动中货真价实的败类，在国家存亡关头以民族的灾难作为个人向上爬的阶梯。

这两种论点的实质，抛去价值道德的判断和利益的不同，都是出于思维的贫困。如施本格勒<sup>49</sup>对唯物、唯心论争的指摘一样：一方把天平倾斜的原因归于左边重了，另一方把原因归于右边轻了。如果我把支点移动一下转换了倾斜，这两方都忙于“证明”对方是何等的谬误了。

至今为止的中国精神思维的历史，都没有达到对中国社会从整体实质上把握的水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只能从其社会的全体形态，包括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精神文明等等去考察。八九中国民运显示了蕴藏于广大民众中的、作为一种精神实质的“民族智慧”是极为丰富、“很有辩证法”的，把这种民族智慧归纳、总结出来是知识阶层的使命，让我们首先从意识形态中透视中国社会。

### 3-1. 共产主义全权政治形态下的中国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萌芽于柏拉图的《国家论》中，由此可以想见它与国家、民族含义的关系，但其广泛的使用则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法

---

<sup>49</sup> 《西方的没落》。

国的唯物论思想家 Destutt de Tracy 的《意识形态概论》。我们知道，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其重要的两个推动力量是近代文明（商业、航海、殖民地利润、资本主义精神等）的来到和民族复兴、成立摆脱教会和君主控制的民族国家的过程。意大利是其开源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佛罗伦萨史》，但丁用民族方言而不是拉丁语写成的《神曲》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艺术作品出产的背景说明。我们较熟悉的颂赞普鲁士的《精神现象学》、痛斥普鲁士庸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的十九世纪，正是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时代，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毛奇的近代军事战争组织形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都是康德、黑格尔的理性精神活动的背景和前提。

意识形态（德语为 *ideologie*，日语也译为观念形态）有两层含义：(1)从根本上制约社会集团的观念、思考、行动及生活样式的信念，相当于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是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其主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例如大陆、台湾、香港都存在着相互区别的意识形态。(2)反映出上述信念并形成体系的理论、思想，相当于一个哲学的概念，要求相对成熟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知识阶层的思维能力。

中国由于精神思维的贫血症，不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就无从加以考察了，这当

然制约于社会的政治形态。考察前一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更需要情感的创造体验。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体验就是精神认同 identity<sup>50</sup>。这个词最先出于心理分析，引申到社会意义上来，主要指知识阶层对当政者的态度，如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对王朝的依附、支持以及无法忍受时的反抗、起义。最近的例子可以从韩国的政局激变中去认识，韩国的知识阶层有悠久的士大夫意识，他们一方面可以不留情地批判学生的过激运动（如冲击美国大使馆、校园中打死警察），抨击左翼政治势力的分裂，另一方面又促使当政者改革，能够对社会进行客观的分析、评判。<sup>51</sup>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几千年专制的窒息没有确立独立的人格，也无法形成独立的精神认同。所以，中国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问题的提起，都是由民族危机、忧患意识引发的。

从林则徐喊出“放眼看世界”，到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注

---

<sup>50</sup> 我主要得益于杜维明教授 1985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座。

<sup>51</sup> 在中、日、韩三国学术交流会上，韩国学者非常羡慕日本学术界不必研究达伦多夫等人的“冲突理论”而只专注于“家庭主妇的消费心理”这样的微观课题。我则告诉他们，中国学者简直是嫉妒韩国学者能够研究“冲突理论”这样的“中范围理论”！

定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更新主要是围绕着民族兴亡的主题展开的<sup>52</sup>。早期民国革命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成长提供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最活跃的基础，科学、民主、议会政治、进化论、《圣经》、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学说，无政府主义、实用哲学等，以比鸦片、炮舰更有力的洪流全方位地涌入全面贫乏的中国。中国社会却根本不可能理解、消化这些思潮，好象游行抗议中所散发的各种传单一样，许多学说刚印刷出来就成了废纸。这种“祖国在危急中！”的功利现实性气氛下，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形成的性质：实时性。共产党的胜利表明了它对外界冲击的反抗强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这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对抗西方文明的殖民主义方面的不可抹灭的功能。

这种由抗日战争确立起来的、缺乏精神实质的意识形态不能在维护了国家统一后充实，反而随着内战爆发而宣告终结。抗战胜利之初，曾有过民主同盟等各种“第三势力”，结果都在国共两党的干戈中落为附庸。罗隆基等中国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既然在内战中声明“共产党有百是而无一非，国民党有百非而无一是”，怎么会被容忍“解放后”再“向共产党进攻”呢？在一党专

---

<sup>52</sup> 最近对李鸿章的肯定，也是由于中国最大洋务派（邓小平）的出现。而最近的“儒家文化中兴论”，与“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手法也很雷同。

制下的知识分子精神认同是被压在水下的皮球，不被允许冒上来“破坏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七六年“四·五”事件，八六、八七年的学生游行，八九民运，与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学生、教授的抗议一样，也是意识形态摆脱政治权力抑压的呼求。

战后分裂的德国、朝鲜同样是国际强权势力化分的苦果，但是，有独立精神认同、意识形态基础的德国在国际缓和的大趋势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统一；没有意识形态独立基础的朝鲜则难以实现统一。统一的基础是各个分裂区域内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达成。今天中国统一的最大阻碍来自国共两党都为己之私利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而特别是在大陆，又没有形成独立于共产党的社会力量。

四九年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有时代意义的进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达到的。李一哲（1974年）的大字报极为痛苦、艰难地要突破现实教条灌输给那一代人的思维贫血症，魏京生的民主的呼声、任宛町的《人权宣言》则明显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界限了。

“四五”运动就是这种觉醒的社会运动的先声，其影响在十年有限改革期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并被理解接受了。而在此过程中，促使新

的高潮到来的首先是文学艺术的进步<sup>53</sup>。中国意识形态的贫乏限制了新时代的鲁迅、巴尔扎克的诞生，但文学却不容推卸地承担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的工作。文学的最大进步在于它首先能以“人”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关系中的人了。<sup>54</sup>

以这种“把人作为人来考察”的基础，经济学由于与经济改革的密切关系，也获得了较大的成果。这也是邓小平所导引的共产党体制比毛泽东时代有理性的基础。对经济规律的探索首先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对外开放的最有力支柱，甚至还渐渐地推动、助长了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的成长，虽然这些带有强烈价值判断性质的领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实际上，共产党把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定为禁区，就是因为害怕人民剥掉其神圣的正统合法性外衣，历史学的微小突破也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从“人”的角度来记叙共产党的历史<sup>55</sup>。与此对比，台湾的学术界最近开始谈论国

---

<sup>53</sup> 例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把毛泽东与传奇武侠并论的通俗小说，以及《河殇》和把毛泽东框入方格（否定）的美术展览。

<sup>54</sup> 《人啊！人》首先把绝对不可能犯错误的大学党委书记作为（不那么好的）一个人来描写。

<sup>55</sup> 严家其的《中国文革十年史》，赵尉的《赵紫阳传》，都占一定的地位。

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的原因了。

教育的功能是通过知识、技能的传授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合格公民。但在中国，教育的危机常常被报道为“四川百万适龄儿童失学”等，好像政府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共产主义的全权政治形态下，教育却被作为其灌输意识形态的手段来使用。从教育的机构中消除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组织和影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否则，公务员制度这样的基于现代公民素质的行政制度的导入也只能是幻想。至于什么“社会办学”、“教育产业化”，无异于表白这个政府已经丧失基本功能了。

共产主义的全权政治形态是意识形态领域卑鄙、庸俗、御用文人的根源；缺乏独立人格精神的中国意识形态几乎无抵抗地接受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强权事实，所以如何对负责启蒙教育的教师进行启蒙是一个严重的没有被提及的问题。最近发生的“蛇口风波”就是一个典型。那些共产主义的传教士的力量不在教义而在强权和实际的功利。大学中占据哲学、思想教育讲坛的只会援引马列教条的干部却把握有学生入党、分配的生杀大权<sup>56</sup>。在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看

---

<sup>56</sup> 笔者 1985 年被校方取消留学资格面临分配去边疆时，曾要求去兰州大学哲学系。校方不允，说：“你不适合教书，因为你会教给学生不合大纲的内容，你只能去实验室搞独自的、不影响他人的研究。”

到：被捧为当代孔孟之道“最高权威”的冯友兰教授要批林批孔，最近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黑格尔研究权威贺麟教授以 83 岁高龄申请加入共产党；无法被压制让其露面的梁漱溟却被打扮成维护旧文化的古董……。青年学生中好不容易兴起的“外国哲学热”，本来可望会给这个民族的思维、道德带来知识和勇气的生机，却很快消失于金钱、“爱情”的追求上去了。

哲学知识是全人类思想财富的结晶，它可以使人认识社会的本质和自我的人生价值。它的直接作用是可以在青年学生的理想追求中抵御功利诱惑。有多少优秀青年跨入大学，因为受到校方党委赏识而失去了人格！所谓“中国人丑恶”的各个方面，都是缺乏基本的信念带来的。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独立人格精神有所提高的话，中国也不会容易实行今天这样的政治全权形态。中国宗教的目前地位很好地说明了信仰的实质：在上帝之上是“爱国主义”，而国家被共产党定为政府、官僚，支配中国人心灵的不是人格上的信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是现实的强权（“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去世之后，这个上帝转为权力、金钱、外国人和台、港、澳等海外关系<sup>57</sup>。这就从精神上预告了中国社

---

<sup>57</sup> 最近国家教委对自费留学的规定突现了“海外关系”

会全面危机的到来。

意识形态的危机是动摇中国整个社会根基的最大破坏力量。十年前，人们排着长队在新华书店门口时，华国锋只用一个警卫排就可以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今天，长队排到商店（买火柴、饭锅、手纸）、银行（买彩票）和到美、日等外国的使领馆（等签证），必须靠全部镇压机器来维持政权了。加速这个危机的，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这个潮流的虚弱、虚伪对应。当正直、关心共产党前途的有识之士发出“信仰危机”的警告时，掌握意识形态机器的御用文人不是化解危机，而是压制对危机的呼吁；学生、民众已经兴起的反对政府腐败的群众运动，却被当局混淆视听，回避现实。<sup>58</sup>

中华民族整体的意识形态的贫乏也是至今为止的各类从事民主运动的团体、个人、派别问题的最大症结。那些靠“人血馒头”窃取“民运领袖”名声，以此为资本与日本、台湾、美国最终与北京政权交易出卖民主运动的败类，与汪精卫相同。就目前的情势而言，确立民族精神中独立人格是最迫切、最有广泛意义的工作。在此特别

---

的优越性。

<sup>58</sup> 如人民大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所”把学生下放到基层，让他们捏造事实，得出“91%支持共产党”的结果，潜伏下更大的危机。

有必要指出卢梭所强调的“公意”与“众意”的区别。“众意”就是由民主程序确定的多数意见，它有时候以少数人(甚至 49% 的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有时候根本就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的，因为大众也是容易被操纵控制的，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全权政治形态下。而目前的中国社会，没有普选等基本的保障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措施，从事民主运动的团体，由于缺乏独立人格的道德约束，简单地诉诸于众意来决定一切，最后只能导致整个组织的决策偏离中国民众，成为一种利益集团而已<sup>59</sup>。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也是以民主、人权、反专制起家的吗？

这种症结的克服，除了西方传来的“民主程序”的学习外<sup>60</sup>，还必须确立继承民族优秀道德垂训的独立人格精神。

### 3-2. 对十年有限改革的回顾

我们之所以重视现在，是因为它可以检验过去，预测未来。但对于任何当代发生的历史之评价，是由不同立场的视点构成的。

---

<sup>59</sup> 在民主中国阵线，真正投入的人不多。但如果只知道民主的“众意”这一层次，就会变成会拉选票的人的工具。把民主运动的目的蜕化成工具了。

<sup>60</sup> 孙文的《民权初步》今天读来，仍不失启蒙价值。

对于十年有限改革<sup>61</sup>，有许多从不同的角度提起的认识，有些是内容对立，有些是形式不同而已。从反对“两个凡是”的党内“检验真理标准辩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共产党的功绩在于它从整体上顺应了人民的要求，代表了中国社会全体的利益。同时，被压抑下去的“北京之春”等民主运动和在全国各地第一次实施的基层普选运动，都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进步。八四年的国庆观礼表示了人民对共产党统治的最高、也是最后认可。此后共产党已经拿不出可获得（骗取）人民支持的新装，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

一九八六、八七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后果是近十年有限改革的严重挫折和转机。这一次运动，实际上在八五年底的半反官方性质（反对世袭和媚外）的游行就预告出来了。官方的媒体一方面渲染大学生们“三热爱”的“运动高潮”，一方面嘲笑“蠢蠢欲动”的西方记者们。八七年已经表明了有限改革面临着新的选择，也表明了中国社会各界对改革认识的肤浅。由此之后影响民众特别是学术界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和观点就带有创新和保守的双重性格。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这样一

---

<sup>61</sup> 此概念我最先用于未被通过的民主中国阵线宣言草案，突出“六四”事件为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局限。

个产物，它既表达了知识阶层对现实的探索对政治的影响，又保留了统治阶层保持其特权的理论依据<sup>62</sup>。无论如何，在这种前提下，以赵紫阳的“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由人民讨论”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协商对话思想为掩护，除了皇帝的新装外，许多问题可以被讨论了。自万里在全国软科学会上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后，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社会调查机构，就人口、家庭、物价上涨等问题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初步打破了共产党对“事实”的垄断。<sup>63</sup> 经济学的进步较为显著，最先从经典引述的无聊游戏中解脱出来进入实证分析的研究。

任何政治性变化的实质都是整个社会的变革。有限改革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的企图，就是力图超越“在党的领导下”的界限。从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现代中国变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等等全面领域的社会形态的变革。这个社会变革，与鸦片战争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抗战运动一样，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对西方文明

---

<sup>62</sup> 陈云一直声称共产党内只有特权现象，不存在特权阶层。《河殇》中原用“特权”一词，被改为“官倒”，好像共产党政府也在反官倒。

<sup>63</sup> 共产党的“调查”本质可以这样表述：“99%的人民是忠于政府的。”因为不服从政府的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冲击的抵抗、调整、适应的过程。以“六四”事件为终结的这十四年的历程是合理的必然，而导致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原因之一，是中华民族没有认识自身创造历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丧失历史给予中华民族中兴机会的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而是整个民族<sup>64</sup>。当然，那些有权势影响的人负有更大的罪过。

当代中国在没有安定的社会基盘和强有力的政治形态的状况下，更需要一个历史的、社会的指导思想为广大民众接受，使各个阶层的人在各自的工作、生活环境自觉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全方位地推动、从事中国现代化过程。民主化，或者说政治上的变化，只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环节。东欧的民主化的胜利，特别是捷克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全体国民中形成了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并形成了全体国民的行动，共产党统治阶层和军队的镇压就不可能了。只要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化成广大民众的思想武器，它就是不可战胜的，不可取缔的了。

关于政治改革的不少论点，由于只着眼、置身于政治权力的转换，易为偶然性所左右。一时悲观，一时又自乐，对中国军队的问题尤为缺乏

---

<sup>64</sup> 八九民运发展到绝食的情势，就注定了其要求的失败，因为运动的胜利确实不能意味共产党象苏共那样的让步，而更可能是比罗马尼亚式更激烈的内战，其结果中国人不可能接受。

信心。“六四”事件是解放军以全体的形式对人民的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屠杀了。军队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十年有限改革中已被动摇了，特别从“六四”事件表露出来民众是不害怕军事危险的，倒是那些想借民主钻营的人吓破了胆。对于军队的认识，与对共产党、对中国一样，只要我们着眼于整体，我们还是会承认：其整体的组织形态还保持有基本理性，否则，它本身就没有战斗力，更谈不上现代化了。军队本身就不能设定为共产党独裁集团的护卫队<sup>65</sup>。“六四”事件后，虽然表面上军内和共产党内的上层盛气凌人，但其实际的运转仍然必须发射卫星、必须在经济上保证民众不致造反，而为了做到这点，就要求其组织形态、人事构造最终必须适应社会变革的大潮流。“体制外”的民主运动会更加促进其变革的进程。

“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会是现实的”。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由腐朽没落的势力代言宣表的。李鹏悍然宣布戒严令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完全、彻底埋葬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年来一切专制借口的合理性、合法性。人民有权力、有能力产生政府，也有权力、有能力推翻任何形

---

<sup>65</sup> 杨白冰批驳“军队中有人认为军队应该中立”，到各处宣布调令，说明军队不是铁板一块。后来，我们也知道，杨白冰本人与其兄杨尚昆正是江泽民急于除掉的隐患。

式的暴政。结束一党专制这个新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成为现实性的。

### 3-3. 适应于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国社会形态

苏联/俄国、美国和日本，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主要的国家。苏联/俄国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思想上的，这无论是指过去对十月革命的继承，还是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新思维，将为中国政治形态上摆脱共产主义的全权主义提供鼓励。但至今为止所有以“全权政治”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选项，这已经从理论实践两方面证明了。

美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功利主义和物质利益，它刺激起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平等、幸福的权力，又特别由于美国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的发达、移民背景和“人权外交”的强大实力，对中国民众和政府产生无法遏止的影响<sup>66</sup>。但是，中国社会也不可能采取美国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是因为：(1)建国的历史不同。美国建国的指导者们都基于欧洲的直到法国革命为止的传统；(2)国家发展的环境不同。美国靠奴隶买卖、庄园主经济、殖民地侵略掠夺战争发家，建

---

<sup>66</sup> 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形式请外国政府官员的子弟到美国来读书。但其效果不详，很难想象那些公子、贵妇能对美国的民主精神有什么认识、理解。

国以来没有一次外敌入侵；中国则不断被侵略、瓜分；(3)现代社会的人种构成不同。对美国社会的各种分析(不平等、犯罪等)都归结到人种问题。中国则面临着地域差异和基于不同地域环境生活的少数民族问题；(4)现代化时代和环境的不同。美国发展有资源方面的先天优势；中国目前的发展可以广泛借世界上已成熟的各种经验、教训。当然，促使美国发展的有许多基本的社会特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的。

中国最好的老师莫过于它原来的学生日本，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如何现代化的最佳样板。日本对中国，不是主动的影响，而应该是我们主动地学习、认识它的成长，其社会形态整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科技的实用性、教育发展的政策、经营的活力、传统社会中新思潮的导入与适应，都是中国现代化急需的知识，却常常被关心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的人们所忽视。

最近韩国保守势力的合并，台湾两党政治的成形，都暗示日本的影响，而中国现在对日本的立场，不再是被动对应，而可以主动认识、学习、取舍了。这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1)文化同源。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易被中国人理解，它特别表明了东方文化超越西洋文明的可能潜力；(2)对民主的接受程度。日本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保守、封建性的，天皇制就是一种象征。其社会

的人际关系上下秩序非常鲜明。日本社会民主的缺乏表现在外交上更为突出，无人权之观念。但是它历史上毕竟深受欧洲、俄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为美国占领军强行实施的各种民主化政策（解放农民、解散财阀、制定新宪法、天皇的人间宣言等）的成功奠定了社会基础。这种民主主义的影响，特别在日本经济成长形成与美国对抗时，更显出日本社会自身的民主主义的重要性。<sup>67</sup>（3）制度上借鉴的方便。日本的现行制度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既有日本原先的传统，也适应了现代化、民主化的要求。

（4）科学技术、经济领域的合作。这一点也是中共政府目前最重视的。（5）在日生活过的留学生、学者几乎不可能、也不愿意长期呆在日本。

当然，“全盘西化”百年以上的日本仍然是日本，而其之所以成为今天之日本，正是多亏了西化的历史。同样地，既然至今为止的“西学东渐”的过程在中国造成了中国的近代史，今后中国社会形态对西方文明的适应仍然将是中国式的。这种适应，就是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可以简略归纳未来中国社会形态的以下特征。

#### （1）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理念

---

<sup>67</sup>世界潮流鼓舞了日本社会革新力量的成长，社会党的跃起，也被认为是日本社会民主主义对世界大趋势的呼应。日本人在投票支持自民党希望继续保持经济成长的同时，也感谢共产党、社会党等革新势力的贡献。

承认个人的人权、自由、人格上的平等，并由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任何政府对于国民的保障都必须首先由个体的公民开始，宪法必须保证公民的权利（财产、隐私权）不是任何组织形态（国家、教会等）可以转让、掠夺的对象<sup>68</sup>。这一点与共产党所指称的“人民”概念不同。“人民”的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用的，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概念的扩张，基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形态认识，为“四项基本原则”服务的，并随着共产党斗争矛头的不同不断被赋予新含义。市民的概念是指受到义务教育，具有社会教养素质，有能力、有责任担负社会义务的有独立人格意识的国民。这样的公民、政党、官僚、工人、农民等各阶层各司其职。

## （2）民族自决与区域自治权

包括宗教、教育、经济、政治等等的涉及民族、区域利益的政策，都必须尊重民族的自决权和区域的自治权<sup>69</su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分裂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其说是为了“调动积极性”勿宁说是其“天赋的”主权（同个人的人权一样）。

台湾问题是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试金石。分裂

---

<sup>68</sup> 这就是《拿破仑法典》的精神，保障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sup>69</sup> 西藏基于现实利益，不一定坚持独立。问题是中央政府要尊重其实际自治、自决权。

的局面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国民党)交恶，彼此都以一党之私重于民族利益为由引起的，统一的达成则需要海峡两岸的民主力量的形成。因为至今为止，中国社会的这两大政治力量都没有反省自身对民族犯下罪过的理性。国民党早就丧失了其法统的客观、主观基础，其清醒地认识到大陆的变革必须靠大陆内部，却不承认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是自身的腐败。

台湾独立最近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从自决权的原则而言，台湾独立与美国的任何一州，如阿拉斯加州想独立出去，是一样的。但是有权力并不意味着有条件、有现实性（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历史文物、黄金等如何处理？），问题在于如何保障台湾的公民在对外关系上的实际权益。其实质性的解决有待于大陆民主制度的建立。

### (3) 社会管理的知识化、职能化和非意识形态化

与以权力为特征的全权主义不同，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形态复杂、专业化地分为不同的职能。政府部门的副部长及以下的实务职能的技术官僚都必须经过文官考核制度才能提拔上来。行政部门中，要排除意识形态的争议，军队职能的分工和性质尤其要求如此。而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必须由普遍选举产生。

十年有限改革有力地促进了这个过程，中国现在的国家行政机能远强于毛泽东留下的体制。

今天从事民主运动的一些力量，由于政治方面受共产党迫害之极，把“打倒共产党”作为纲领提出来，引起了许多争议。这个口号本身无所谓正确和错误，只是不合适而已，因为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可能再进行一次四十年前那样的对国家机器的大破坏了。对于苏联、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全权组织形态，其政治的影响触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能在共产党内、外促使其内部革新以适应整个社会的变革。

#### (4) 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

在马克思时代，可以用商品、货币为细胞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今天，这种立场依然有效，但不是唯一的理论依据。在共产主义全权社会形态，权力是更有效的资源。现代社会的利益来源不止一个，也不可能由一种关系解释所有社会关系，故总称社会资源(或社会财富)。它包括经济(收入、财产等)、地位(职业)、荣誉(关系网、学历)以及主观的认同(甚至偶像崇拜、宗教)，使社会的分化不单纯地表现为一元的上、下不平等关系而趋于复杂，特别是现代生活中个人持有主观的判断基准，每人重视的社会资源侧面不同，可以把社会不平等的事实消解不少。

单就经济而言，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似乎较为可取，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生产过程中多借鉴成熟的资本主义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方面，通过税制保障社会公正。

### (5) 自然保护与资源开发并重

人类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经济、安全的能源开发途径，自然资源随人类的进化已经被破坏掉不少了。整个地球环境根本不允许西方国家象以往那样的速度增值提高消费水准，不发达国家要达到目前西方国家那样的消费水准也是不可能的。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实际上也是人类自身组织形态的反应。自然资源越接近限度，对人类社会结构的重组要求就越迫切。

### (6) 开放国际交往，维护世界和平

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是以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贡献来决定的<sup>70</sup>。中国这样的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悠久历史的大国，对国际社会参与不应该是军事力量的威胁，而首先要建成尊重人权的民主社会。随着美苏缓和的世界趋势，中国应该积极响应，促使全世界最终灭绝核武器和大规模的战争。首先应该公开明确地宣布不对台湾地区实行武力政策，其次要签署亚洲地域和太平洋海域的安全条约，放弃扶助小国独裁政权的外交政策等等，成为国际社会可信赖的和平、安定的主要力量。

---

<sup>70</sup>有许多中国的发明被当作日本的创造推广到世界去了。撇开感情的争论，我们承认日本的推广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够对世界文明做出很大的贡献是因为它首先吸取溶进了世界文明武装了自身，具备了对人类贡献、影响的资格、条件。

在现在的国际社会中，对人类的贡献，自身民族的振兴，包容所有世界文明的优秀财富，是一个国家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同一本质。在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剧痛中<sup>71</sup>，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变革成功的参照和选择。

1990年5月1-10日大阪第一稿  
1995年1月30日-2月3日三岛第二稿<sup>72</sup>

---

<sup>71</sup> 不用担心有限改革因为“六四”镇压的终结，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朝新的、全面变革的扬弃和升华。

<sup>72</sup> 修订时几乎没有加入1990年以后的思考研究，主要是删掉没有保留价值的占20%篇幅的引论。

### [出版说明]

我在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4月号发表约9千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与中国的未来”文章后，收到一些反响。日本学者东扬仁在致《民主中国》编辑部信中评论到：“对于赵京《社会民主主义》的感想：作者知识很丰富，研究很深，令人佩服。尤其是2-1(第13-14页)、2-2(14-16页)好。...我觉得内容有点过深，特别是第10页的图表我根本不懂。”其实，此文不是学术论著，而是普通读物。我的写作都是面对普通大众的。

1990年5月，我把它扩写成约4万字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国社会形态论纲”，发表在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9、10、11月号。同时，一家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刊物也发表了此文。这大概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较为系统考察的第一份中文文章，读者特别可以感受到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反思。后来，我于1995年1月30日至2月3日简单修订此文，但没有机会出版。

间隔十八年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转型中剧痛的中国社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关心不断提高，所以，我决定简单修订1995年版原文，改变标题以第二版的形式出版。我最近出版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978-0-557-01635-8、《韦伯论社会主义》ISBN:978-0-557-01998-4和《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ISBN: 978-0-557-03086-6（皆为同一出版社）中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有进一步的评述，希望读者同时参考阅读。

### [作者简介]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所长。其部分非思想性的观点也通过一些主流媒体（南都周刊、金融时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The Wall Street Journal、自由欧洲电台、BBC、H-NET、朝日新闻、Sino-Japanese Studies、西班牙当代史协会刊物等）为中文、日语、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波斯语世界所知。

Price: \$10.30

ISBN 978-0-557-02645-6

90000



9 780557 026456

